

## 第六章 外拓开放 延展虚拟边疆

### 第一节 开放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回顾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所有繁荣昌盛的民族都是开放的、兼容的。中国经济由盛转衰、再到今天的飞速发展，都是与社会的开放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另外，从全球视角看，世界其他国家的强盛与衰败也是和开放与封闭同步变化的。

古代的中国曾经创造过为世人所惊叹的东方辉煌。公元1600年以前，世界上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有60%来源于中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当然这一数字不具有真正的国际意义）；古代的中华文明更是影响广泛，其形成的思想精髓直到现在还是东亚文明的核心所在。尽管当时“天朝大国”的中心论观点为统治者所信奉，但接受周边各国朝奉的同时也加速了民众间经济、技术、文化、思想的交流与往来，这正为中华民族长期强盛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源。但历史发展到近400多年，中国日益增强的封闭、保守严重禁锢了民族的发展。通过禁止贸易往来、思想交流等一系列闭关锁国政策隐藏不思进取的落后心态和封建体制的消极作用，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即使原本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也会由于与世隔绝而陷入“无用”和“落后”。于是，中国开始衰败，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逐渐冷却和衰退。

欧洲曾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从11世纪起开始向外进攻，十字军东征是这种对外扩张的明显象征。暴力与野蛮的因素暂不考虑，对外扩张带来了广阔的市场、自由与开放的思想以及异常活跃的贸易交流。如此宽松、大融合的氛围为接下来的科

技革命、制度创新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欧洲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宰。

### 一、思想解放与经济开放释放无限能量

尽管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生产力日益国际化，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同步、同程度地汇入开放型经济的潮流，毕竟从资源禀赋的不足和资源互补的需求来说，各国的具体情况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国发展现代开放型经济的尝试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基本处于“深垂竹幕”的封闭型经济状态。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历程，从国家决策层到普通民众才逐渐将传统观念转变，明白了“封闭将陷于落后、开放才能加速发展”，进而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才使中国的经济运行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汇入现代的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对外开放既是顺应当今世界潮流的明智举措，也是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从此，中国将不再对外部世界关闭门户，而要在生产国际化和经济运行国际化的潮流中分享可能得到的发展利益。

中国的开放是分步骤、分阶段推进的过程，对外开放成为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量。从封闭型经济转变到开放型经济，最困难的事情是难以冲破思想意识方面的封闭。这是因为，在长期封闭的环境里，封建体制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心论”思想，产生和发展了阐述封闭合理的理论；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加以解放后的孤立处境，很自然地会形成经济独立的自豪感和排外情绪，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反映，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人们的潜意识。对外开放的推进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进而开启了其他各项改革事业。

中国的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渐推进的，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举动大大加快了非生物物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于是，在渐进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先开放所获得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使开放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最早开放的是特区，即在国家主权之下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的地区。为了降低风险、避

免给本国主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又对开放策略进行尝试与成效检验，率先发展特区以实施“经济开放为先”的战略是最为经济的方式。深圳特区的成功证明了开放策略的正确性，于是，国家政策便由先在经济特区开启门户逐步扩大开放，进而全面形成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经济特区是了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以及对外开放的“窗口”，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外大千世界的经济动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外国人也可以从这个“窗口”看到中国的经济和政策动向。经济特区的吸引力不仅表现为引进了大量外资，也表现为引进了大量内联资金，成为衔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两个辐射式扇面的“枢纽”，表现为与国际资本打交道的“阵地”，还表现为特区开放、开发和改革交织在一起。许多事关全国的新措施往往是在经济特区先期试行，从而成了改革和开放的“试验场”，成了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同时进行着改革事业的“试水”。

## 二、开放彰扬市场的巨大潜能

近年来，随着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实践上对市场经济模式认可和采用的程度也随之逐渐提高，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为选择之后，市场经济最终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经济市场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操作层面考察，根据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市场可划分为投入方面的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以及产出方面的产品市场（实物形态的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非实物形态的商品市场）。

现代要素市场由资本、劳动力、土地以及技术和信息五种市场构成。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是传统的市场要素，而技术和信息则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凸现作用。资本市场是要素市场之

首，它是最国际化、最现代化、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市场，考察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运行平稳是其最大特征。从 2004 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广义货币余额 253000 亿元，狭义货币余额 96000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4.6% 和 13.6%；金融机构存款稳定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53000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5.3%，金融机构贷款也适度增长，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89000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4.4%；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再以技术市场为例考察，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素中愈来愈重要的要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其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因此，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反映，又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技术市场的成交额逐年增加，成交额的增幅逐年提高。可见，中国技术市场持续发展且势头迅猛。

产品市场是市场经济诸市场中形成最早、规模最大、联系最广的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的产品市场也是发展最早且最快的市场。200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539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0.2%，增速比上年加快 1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城市增长 14.7%，农村增长 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增长 12.5%，餐饮业增长 21.6%。新的消费点持续升温。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中，通讯器材类比上年增长 41.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3.7%，汽车类增长 23.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45.9%。从产业发展看，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惊人，200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 43384 亿元，几乎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的两倍，增长 8.3%，增速加快 1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服务市场正处于快速或加速发展期。

其实，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表现在操作层面，而且体现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在制度层面上，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化安排正在让位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化安排；在观念层面上，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正在被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思想意识

和价值观念所取代。而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市场化又保证和推动着操作层面的市场化。

### 三、改革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

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表现在对外开放和内部开放两个方面。中国社会的开放首先是对外开放，它是中国社会开放的关键；而内部开放则是中国社会开放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内部开放程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中国打开国门的策略是“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多层次，是指形成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外到内的梯次开放格局。第一层次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五个沿海经济特区；第二层次为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第三层次为闽南三角地带、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经济开发区；第四层次为内地即中西部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也加入到了对外开放的行列。多渠道，是指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和经济合作。从输入角度看，有引进资金、引进设备、引进技术、引进管理人员和管理经验等形式；从输出角度看，有商品出口、技术出口、劳务出口等形式。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从 1978 年到 2004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呈跨越式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355 亿元猛增至 2004 年的 11547 亿元。

中国的内部开放成就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社会沟通与社会流动。社会沟通，也叫社会传播，是指人们彼此交流思想、感情等各种各样信息的过程。社会沟通是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因为它通过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和书信、电话等个人传媒将不同的社会系统、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其相互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沟通或传播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以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为依托的大众传播现已朝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即文化产业的出现。仅以文化产业

中的传媒业在中国的发展考察，中国传媒业发展迅猛，各种报纸、期刊、无线广播、电视媒体不仅数量上成倍增长，且其经营市场化的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短短 20 多年，全国已建广播电台 304 座、电视台 354 座、广播电视台 1272 座，拥有有线电视光缆、电缆干线 30 万公里，有线广播电视用户超过 9000 万，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 92.33% 和 93.6%。现在，一批传媒集团已经形成，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集团和各省区市广播电视集团相继成立，传媒资源和市场的整合与综合开发正迎来新的局面。2001 年，全国成立有 26 家报业集团，当年共出版报纸 2111 种，总印数 351.06 亿份；出版期刊 8889 种，总印数 28.95 亿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年赢利达 14 亿多元人民币，《北京青年报》的年广告赢利也达 8 亿元人民币。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社会位置的变动。社会流动程度的高低与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而与社会结构封闭程度的高低成反比。因此，社会流动是社会开放的又一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状况因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而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流动急剧增加。首先，不仅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志趣选择职业、地区及单位的社会流动日趋增多，而且出现了成批社会成员“改行”、“易地”和“跳槽”的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出现的“经商热”、“出国热”、“孔雀东南飞”及“民工潮”都是社会流动急剧增加的反映。其次，社会流动的急剧增加还表现在原有阶层社会成员的内部流动和相互流动的增加。农民阶层中，职业变动（离土）和地域变动（离乡）并存；工人阶层的体制变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日益完善，使工人突破原有的单位体制限制而向更广范围流动；干部阶层的分流，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加速人们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化。另一方面是社会流动日趋合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对城乡户籍制度和人事编制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流动不仅急剧增加，而且日趋合理。从流动主体看，社会流动正在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

转变；从流动客体看，社会流动正在从消极控制型向积极吸引型转变；从流动过程看，社会流动正在从有来无往、有进无出、有上无下的单向型流动向有来有往、有进有出、有上有下的双向型流动转变。

## 第二节 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反思”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地向有市场、有成本优势的国家 and 地区转移，而且研发环节和服务贸易也开始“外包”。国际贸易更趋活跃。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从 1978 年的 17000 亿美元增加到 2003 年的 80000 多亿美元。同期国际货物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6%，是世界经济增速的 2 倍以上。国际投资快速增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从 1978 年的 343.5 亿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14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8.3%，远高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速。2001 年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虽然大幅下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当前又趋于回升。跨国公司的作用更趋明显，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从 1978 年的 5 万多家增加到 2002 年的 94 万家。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 1/3、国际贸易的 2/3、对外直接投资的 3/4。

面对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积极投身于其中，最大限度地扩大开放，以自身的实践规划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选择。

### 一、开放铸就的世界诸强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个大国的崛起无不与其采用的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开放融合的政策有关。

#### （一）具有开放心态的美国人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是当今世界所公认的头号强国，其经济发达程度在全球首屈

一指。尽管如此，美国说到底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比英国晚几十年。直到经过南北战争，美国在经济上才彻底摆脱了对英国和欧洲的依附，奋起直追，以惊人之速度在短短 30 年时间内迅速赶上并超过英法，实现了经济起飞，搭上了英国重商主义的经济快车。考察美国用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种种措施，其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策略对其实现经济起飞至关重要。

早在殖民地时期，移民们就注意从欧洲引进先进的生产方法和工艺技术，并逐渐将它们吸收、消化和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对先进技术的引进，许多开国元勋，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逊和亚当斯等，都是鼓励技术引进和提倡发明创造的身体力行者。为此，联邦政府于 1790 年成立了专利局，旨在奖励技术引进和创造发明。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后，英国逐步解除了技术封锁，使美国得以大量引进英国的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加速工业的发展。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联邦政府对经济事务和科学技术活动的干预开始加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以独创为主的新阶段。与此相适应，在技术引进上，美国已不再机械地、盲目地照搬欧洲，而是有选择、有针对、有重点、有目的地引进那些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以便迅速适应加速工业化、赶超欧洲先进国家的需要。

独立战争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还是一个资金匮乏、科学技术落后、劳动力不足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早在工业化初期，为了解决资金的不足，美国政府就实行保护私人企业利润的政策，积极吸引外国商人和资本流入美国。南北战争前，进入美国的外国商人总计达 237500 人，其中包括摩根（英格兰）、梅隆（爱尔兰）、库恩——罗比（德国）和杜邦（法国）等著名财团的创始人<sup>①</sup>。仅 1839 年，联邦政府及各州就向欧洲（主要是英国）借款达 2 亿美元<sup>②</sup>。到 1860

① [美] 本·巴每克·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1971 年英文版。

② [美] 波耶特著，畑野武男译：《美国经济史（日文版）》，1941 年日本生活社出版，第 268 页。

年，外国所持的联邦政府、铁路公司以及其他种类的债券，约4亿美元<sup>①</sup>。

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在各条战线上突飞猛进地展开。一方面，西进运动大规模地进行，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南部的改造和重建、国内市场的急剧扩大，都强有力地吸引着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世界经济关系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资本的国际化趋势为外国资本流入美国提供了可能。就在这时，美国的华尔街通过与欧洲伦敦金融中心的对接，通过把欧洲的投资与投机资本引入美国经济，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支撑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中的战争融资，推动了美国由铁路带来的第一次重工业化浪潮，扩大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也实现了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向新经济成功转轨的进程。1873年以前，美国投入铁路建设的资金共3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外国资本<sup>②</sup>；1907年，美国铁路总价值的1/4以上为欧洲主要是英国所掌握。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经过“一战”、“二战”的洗礼，美国的工业生产已占到世界的1/3，贸易值占世界贸易总值的近一半，黄金、外汇储备占世界的2/3，成为不折不扣的“金元帝国”。“二战”后，在西欧与日本的经济重建过程中，美国以“马歇尔援助”帮助西欧复兴，经“道奇计划”帮助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俨然成为世界经济的“恩公”与霸主。西方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以美国为中心。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一度陷入经济衰退，但短期内就摆脱了困境，出现经济回升，并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所谓的美国“新经济”局面。其实，美国经济十几年来来的骄人业绩，仍然主要源于坚定的开放经济理念与实践。

## （二）勇于开放的日本加入了强国俱乐部

中国的近邻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终于完

① [美]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0页。

② [美] 哈劳：《美国的成长（第1卷）》，纽约，1943年版，第55页。

结其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被迫开放了自己的国门。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日本仅仅花了40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国际条件。一方面，迅速地把欧美国家的先进工业技术引进日本；另一方面，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中国满清政府的腐败，大举入侵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原料和销售市场，发展了自己的工业，从而变成了东方的帝国主义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战争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面临崩溃的边缘。为了东山再起，重新争夺国际市场，战后日本在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战后40多年来，日本充分利用了国际经济联系，博采世界各国技术之长，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巨人”。由于日本是“资源小国、人口大国”，必须以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与国外的天然资源相结合，确定“贸易立国”战略，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外向化过程的统一。随着世界性技术革命的发展，技术贸易也活跃起来，成为战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国际技术贸易的不断扩大，给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日本大量引进和应用世界上现成的科技成果，并把劳动密集型、活劳动耗费大的产业向劳动费用低的地区转移，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国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的高技术大国。从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商品输出以轻纺工业为主，此后转为以重、化工业品为主；60年代中期，日本主要出口钢铁、船舶，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技术；70年代，主要出口钢铁、合成纤维、家用电器、汽车、光学仪器，靠的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并加以改进，不断制造新产品；80年代，主要出口汽车、电气机械及其零部件、电子计算机、钢铁，靠的是科学技术上的竞争能力。

### （三）外向型经济哺育了亚洲“四小龙”

亚洲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南朝鲜（现称韩国）、新加坡的共同特点是土地少、资源贫乏、市场狭小，在工业腾飞前唯一可依赖的“资源”是拥有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然而，自然资源的短缺并没有阻碍其发展。“四小龙”（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的合称）的经济起飞大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此时正值发达国家经济高涨，世界市场飞速扩大，“四小龙”的发展也正是充分利用了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在新技术革命的促进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加速了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新兴工业过渡。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空缺，这正好为亚洲“四小龙”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正是外需的强大拉动作用为“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原动力。加之当时正是世界经济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商品市场容量很大，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弹性也较大，因此为“四小龙”价廉质优的加工制成品挤进发达国家市场创造了条件。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由于能源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制约，再加上传统工业发展到极限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时期，于是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痛苦的长时间的结构性调整。“四小龙”又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大力引进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业的技术，并将失去优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由轻转重的产业升级，通过外向型生产取得了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入场券。

从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历程来看，无论是早期的经济起飞还是当下的“新经济”繁荣，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其提升整体竞争力的核心理念。实行对外开放，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加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国家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和积极因素，跨过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跳跃式地前进，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原来先进的国家。当

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技术交往日益密切，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都应当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

## 二、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新型开放形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全球资源、文化等各种要素的自由流通，将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开放的大市场。全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步骤推进，区域一体化可以看作是要素流通率先在几个国家或某些相关地区间自由流通的状态。区域市场是开放的世界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区域一体化是一国开放的扩展与深化。

区域经济体的建立意味着对来自非成员国商品的排斥。非成员国为了抵消这种不利影响，就会将生产点转移到一体化组织内的一些国家，在当地生产销售，以便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样客观上便产生了一种伴随生产转移而产生的资本流入，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从而实现区域经济体的比较优势<sup>①</sup>。另外，由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对内开放市场，各国企业面临来自其他成员国同类企业的竞争，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改善生产经营，不断降低成本，增加创新力度，最终形成“鲶鱼效应”<sup>②</sup>。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条件，各个竞争企业之间也因无限次博弈使得信息交换充分，知识交流、技术共享得以实现；由于管理区域的集中，行政管理成本也大大减少，区域内交易成本将远低于区外地区。市场竞争的加

<sup>①</sup> 在这里比较优势是指区域一体化通过成员国之间商品流动壁垒的拆除，消除了扭曲各成员国比较优势的非市场因素，使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得以充分体现。

<sup>②</sup> “鲶鱼效应”，西班牙人爱吃沙丁鱼，但沙丁鱼非常娇贵，极不适应离开大海后的环境。当渔民们把刚捕捞上来的沙丁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后，用不了多久沙丁鱼就会死去。而死掉的沙丁鱼味道不好销量也差，倘若抵港时沙丁鱼还活着，鱼的卖价就要比死鱼高出若干倍。为延长沙丁鱼的活命期，渔民想方设法让鱼活着到达港口。后来渔民想出一个法子，将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放在运输容器里。因为鲶鱼是食肉鱼，放进鱼槽后，鲶鱼便会四处游动寻找小鱼吃。为了躲避天敌的吞食，沙丁鱼自然加速游动，从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此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这里比喻区域内同质企业因相互竞争而各自提高了自身的市场生存和发展成长能力。

剧势必会促进各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进一步拉大与非成员国的差距。由于区域一体化组织形成由成员国组成的统一大市场，因此会增加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国际商务谈判能力，最终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sup>①</sup>。

欧洲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近半个世纪以来，欧共体通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货币同盟促成了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由于其内部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且与其他国家或区域性实体的良好交往频繁，成为目前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968年7月，欧共体实现了内部取消工业品关税、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的目标，建立了关税同盟；从1985年开始，欧盟机构和成员国采取数百项措施，以消除区域内商品、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技术、法律法规、行政、文化等障碍；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申根协议的出台进一步扫除了欧盟内部资金与人员流动的障碍；在共同的反垄断政策、反倾销政策、农业政策、进出口制度、渔业政策等的实施过程中，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政策自主权，欧盟开始向经济同盟转变；与此同时，欧元诞生了。欧元从最初的备受质疑，到现在的平稳运行，已成为加深欧盟一体化程度的重要因素；欧元区内的贸易、投资因扫除了汇率风险而更加活跃，市场要素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欧盟在不断推进内部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与地中海国家、独联体国家、ACP（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多层次的经济贸易合作安排。欧洲各国的开放理念不仅作用于区域内部，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加入其推动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

<sup>①</sup> “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指区域一体化不仅为已经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带来丰厚的经济效应，而且使已经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这样必然激发区域外部国家参加区域一体化的热情，扩大区域一体化的利益来源，提高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水平。

### 三、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盲目排外、拒绝现代化史

进入明代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大明王朝的稳定、维系帝国尊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明代的海禁到清代的只留一口通商，闭关锁国成了基本国策。中国幅员广阔，农村生产条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优越，能够实现低水平的自给自足，这就更有利于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纷纷侵入，中国被动挨打，这就愈发强化了国人闭关锁国的心理。盲目的排外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拒绝融入世界市场的决心，特别是中国封闭内卷的心态、视新文明为异文杂种，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选择改革道路的同时，把对外开放列为基本国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的历史性起点。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将更深刻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会更加紧密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大系统中，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进程，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要加速融入全球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迎接全球化浪潮下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履行关税减让、市场准入、非歧视原则等承诺，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把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提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 四、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将是提升中国竞争力的第一要务

中国最大的国策是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顺应世界经济发展

趋势的需要，俗称“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是对外开放过程中观念和姿态的彻底转变，即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欢迎世界各国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中国自身也要走入国际市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点和潮流。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就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潮流，主动“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实际上，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在世界范围内从资金、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分享、获得效益。

首先，“走出去”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合作深化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要素突破国界，要求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正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从而给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希望加强同中国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合作和其他经济技术合作。中国企业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不仅可以增加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会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只有主动地走出去，才能发挥中国自然和经济的比较优势，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增强了对“走出去”的迫切要求。权利与义务平衡是世贸组织成员遵循的重要原则。“走出去”是实现“入世”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重要途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向其他成员履行承诺、开放市场的同时，其他成员也向中国开放市场。我们要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充分享受相应权利，实现权利和义务平衡，就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货物、技术和服务出口，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们就不可能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过去我们仅有中石化等3家企业进入跨国公司500强，截至2007年7月，中国大陆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已达22家。中国企业要在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加速发展的进程，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就必须面向世界，“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直接面对国际企业的竞争，直接学习到那些掌握在发明者手中和转让受到限制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更好地了解国际企业发展的趋势并直接了解当地市场，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到国际市场求生存、谋发展。

第三，“走出去”是提高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如果仅在国内进行，空间相对较小。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当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样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走出去”的企业必定直接感触到国外产业发展的未来走向，有利于国家对本国产业战略选择进行适时调整，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的步伐，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加强中国战略物资的储备，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石油、天然气以及许多重要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等蕴藏量不足，即使国内拥有一定的资源，人均占有量也较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在国际市场上配置资源，加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与综合利用，为中国获取重要资源提供相对稳定的来源，实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走出去”既然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其定位是否正确必定关系整个对外开放战略的成败。抓紧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既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内在要求，又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走出去”战略格局，才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优化配置资源，这不仅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举，而且也是关系国家改革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举。

在地域选择上，中国要发挥地缘上的优势，优先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把整合东亚区域经济作为“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关于“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一轴两翼新格局”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构想正在酝酿之中，其蕴含的更深层次的考虑是要构建一个区域合作的新格局。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包括中国、越南，以及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和投资环境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产业需求与中国的转移比较对口，并可带动技术、设备、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一揽子转移，且其丰富的资源和辽阔的市场为开发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成为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助推器。

另外，中国还要加大在先发国家的投资，弥补 GDP 与 GNP 的重大缺口，构建覆盖全球的华人经济圈和华人投资网络。GDP 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只计算在中国境内产生的产值，而不管它属于哪国人；GNP 则是指的是一国国民所取得的收入，不管这种收入是产生在国家的国境线之内还是在国境之外。由此可见，国内生产总值是“领土”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生产要素”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收入”概念。在经济封闭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开放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国外净要素收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竞争演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质量为主的竞争。中国对外投资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的生产要素分布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中国的对外投资要以国内产业为依托，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框架（MFI）的谈判，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纺织、轻工、机电产业，应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实现“全球生产，全球经营”；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应积极投资于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更好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设立研发机构或孵化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

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对外发展的领域上来说，商品、劳务、资本、技术，各种要素都可以“走出去”。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资本、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尤其是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服务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直接地冲击和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国也不能单纯依靠货物贸易去占领国际市场，必须进一步发挥特长，借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机，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中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把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有市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企业，鼓励“三来一补”等出口加工产业、创汇农业、兴办出口加工区，以及利用中国的技术人才优势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采取多种输出渠道，拓宽中国劳务输出的途径，以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减轻劳动力过剩的压力；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开发资源、融通资金，弥补中国资源和资金短缺的不足。

### 第三节 参与制定规则 实现和平崛起

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历时 15 年的“入世”谈判终成正果，重回世贸组织正是中国社会走向全面开放的标志。机遇降临之际，挑战也破门而入，“入世”将对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 WTO）本质上有一系列经济贸易规则与规范体系，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守，因此“入世”意味着中国必须加快学习并适应国际规则与规范。只有参与制定规则，才能实现和平崛起。

#### 一、审视中国国情与国际规则的差距

WTO 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其规则与规范是现代国际经济与贸易价值的集中体

现。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 WTO 的基础，凡是加入 WTO 的国家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者是必须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接轨。市场经济的通义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促进自由交换。因此，WTO 自然推崇自由化机制，包括贸易自由化机制和投资自由化机制。自由贸易是指在无限制的条件下各国之间进行的商品劳务交换活动；通过实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逐步减少乃至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以便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而投资自由化机制即是要取消那些对贸易自由化带来消极影响和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确保自由竞争，有利于跨国投资，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其次，市场准入制度是 WTO 的重要制度之一，旨在通过增强各国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减少和取消关税、数量限制和其他各种强制性限制市场进入的非关税壁垒，以及通过各国对开放本国特定市场所做出的具体承诺，切实改善各国市场进入的条件，使各国在一定期限内逐步放宽市场开放的领域，加深市场开放的程度，从而促进世界贸易的增长，保证各国的商品、资本和服务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公平、自由地竞争。另外，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它可以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和障碍以及国际贸易中的冒牌商品问题，对于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现行外经贸政策的组成包括，出口方面：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进口方面：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措施、利用外资方面的相关政策。认真考察现行的外经贸政策，与 WTO 国际规则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市场准入原则方面审视，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仍然带有较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调节工具还是行政控制，市场机制仍不能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来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有比较明显的保护地区和部门倾向，与竞争原则政策相悖。

从关税政策来看，中国的关税改革仍需加快推进。关税减让以互惠互利为基础，旨在降低进出口关税的总体水平，尤其是降低阻碍商

品进口的高关税，由此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经过近十年的调整，中国关税制度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关税大幅下降，调控作用日益增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名义关税水平偏高，导致贸易摩擦频繁、汇率不稳、走私现象严重；关税的有效保护与贸易优势的动态变化不相适应，对资本、技术密集的幼稚行业（如电子通信设备等）保护不够；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差距较大，产生企业竞争间的不公平现象。

从利用外资方面看，中国的国民待遇原则还未贯彻彻底。尽管中国逐步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但还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并存的状况。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所得税、生产经营权和关税等方面享受特殊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又受到当地成分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出口为进口先决条件，出口实绩要求，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审批手续复杂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

## 二、学习国际规则，改革现行政策

推行现行政策的改革以适应国际规则，是中国深入市场化、不断开放创新的必然要求。当前，对经贸、税收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改革是最为迫切的。

1. 要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一要树立明确有力的产业政策导向。对已经具有一定竞争力并将实行零关税的产业和重点企业，需要由国家制定明确的产业扶持政策，增强对这些产业和企业科技开发、投融资、进出口、境外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使它们能得到快速发展，初步具备国际竞争力；对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国家要给予产业政策倾斜，为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到该领域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特别要加大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实现根本性的产业赶超，如构筑以政府为主导，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等。二要采取积极措施扶持比较优势产业并加快造就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获得国际贸易利益的基础；掌握了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分布状况，政府便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优势产业企业加快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企业家是带动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企业前进的引导者，一支具有高度民族责任感和经营水平的职业企业家队伍对于民族产业的振兴意义重大。因此，政府应当大力推进企业改革进程，在企业内部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对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建立对企业家的市场评价机制，以科学的方法选拔与管理企业家，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2. 加速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与其他各国经济交流的最主要手段，在中国加入 WTO 以后，对外贸易更成为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前沿，因此迫切要求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应通行规则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全新管理机制。要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观念，加速贸易主体的转变，减少专营性进出口商品种类，简化海关、商检管理程序；建立健全外贸调控管理的法律体系，按照国际规范修改完善现有外贸法律法规，树立公共行政意识，依法行政；建立以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和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体系为核心的外贸促进机制，包括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独立的外经贸信息服务机构；还要加快对进口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设，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

3. 加快税收政策调整。出口方面，中国现存退税办法不一致、退税税率繁多，要集中力量对此加以清理、整顿，使之统一；海关等政府部门应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简化退税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加快退税返还速度。从长远看，要逐步实行从“先征后退”向“免、抵、退”过渡，实现零税率，改善鼓励出口政策的效果并从根本上消除现行出口退税政策中的各种弊端。进口方面，其改革取向有三：逐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改变关税保护对国内价格信号的扭曲，避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优化关税的有效保护结构，将成熟产业推向国际市场，从实践中提高其竞争能力，而对新兴技术产业等幼稚产业，则给予适度的有效保护，为其成长提供良好的氛围；缩小实际关税与名义关税的差距，这是改变竞争条件不公平并减少对产业政策和产业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最直接方法，主要应参照

国际惯例，从较长远的角度为企业最终融入国际竞争创造条件。

### 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改变非均衡的全球化局面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全球化所致力实现的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目标，为大多数人积极推崇。经济全球化反映了世界生产力的客观现实和最新发展，是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的有效途径。

尽管全球化的确能给人类带来上述福祉，但其未能顾及公平和公正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全球化在本质上具有非均衡的性质，即先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悬殊的和不平等的，其经济收益也存在巨大反差。

当然，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是非主流的，造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重要一员，必须探究造成非均衡全球化的原因，才能选择正确路径以避免或减小消极影响，争取与先发国家共享全球化利益。说到底，造成这种非均衡现象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即至今依然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制度和规则通过规范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全球性制度的实质内容反映出经济贸易新秩序，决定着全球经济的利益分配格局。

中国逐步参与国际规则的商讨与制定，应当极力促成各国相互协调，在融合多国的国内规则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国际规则。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各国平等协商、确保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的相对均衡、稳定和顺利的发展。具体来说，我们首先要树立全球化规则参与者和制定者的主动意识，正确权衡利弊得失、趋利避害，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方略。民主化和法制化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重要条件；对外政策上，除了开放和吸引外国资本外，还要增强制度意识和经济

安全意识，切实认识到从制度上维护自身权益才是根本有效的方式。

总之，本着更好地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的目的，中国在新世纪要以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为方针，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在充分遵守国际准则和各种双边、多边协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保持有充分的发言权。

#### 第四节 建立“华人经济圈” 试水“亚元区”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和国家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渐提升，又鉴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文化向心力的有力驱动，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国家内部不同体制的经济开始不断谋求积极合作以共同发展；同时，散居海外却对当地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巨大推动的华人也开始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向中华大市场靠拢，由此为“中华经济圈”的构筑提供了可能。

##### 一、构筑“华人经济圈”，深化经济开放

“华人经济圈”是以民族血统的联系为基础，强调现实中进行着的华人社会、华侨企业与中国（祖籍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其地理覆盖面而言，它偏重于东南亚，主要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各国（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的华人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而通过其外延的延伸，它又不只局限于东南亚这一地理区域，还包括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各国人口中的华人部分，这些华人自然地隐含着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承袭。

##### （一）不容忽视的华人经济实力

华人对世界经济所做的贡献恐怕是其他民族所无法企及的。追溯历史，中华经济几乎是古代经济的支柱，即使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华人的经济实力也不容低估。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

经济成就，无论从总量还是从速度来说，都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香港、台湾等不同制度的经济体也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为亚洲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而除去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外，海外华人所创造的经济成绩更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部分。

在东南亚各国中，华人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如在印尼，华人与华裔仅占总人口的3%~4%，但是占该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7%，而印尼人仅占11.2%；在印尼的十大银行中，华人占9家（武斌，1995：252）；在25个最大的商业组织中，由华人财团控制的有17个。据一位泰国观察家称，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泰国商业及制造业资产的90%和银行资金的50%，为占泰国人口10%的华裔所拥有；菲律宾67种最重要的商业用品中，2/3由华人企业供应（周永亮，1995：186~187）；70年代马来西亚最大的8个企业集团中，华人有4家（武斌，1995：278）。华人注册企业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三国股票市场的股票市价总额中分别占到73%、61%和89%（周永亮，1995：214）。

在美国的华人经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也在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互动中迅速崛起。据美国商业部198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1982年华裔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已居美国各少数民族裔之首；华人企业共有52839家，为数最多（李春辉、杨生茂，1990）。西欧各国华人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之中，例如法国的“陈氏兄弟公司”，1992年的营业额超过7亿法郎。

据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侨问题中心的估算，1993年底海外华人总数约为5500万人（包括台湾省），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为2000亿美元，生产总值约为5000亿，其流动资产超过了中国大陆，约占日本的2/3。该中心计算的1993年除中国大陆外的华人人数和拥有的外汇储备额如下：中国台湾2090万人，828亿美元；中国香港590万人，371亿美元；泰国658万华人，234亿美元；马来西亚616万华人，154亿美元；新加坡236万华人，437万美金；印度尼西亚

505 万华人，111 亿美元；菲律宾 76 万华人，43 亿美元；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总数为 321 万人，约 20 亿美元（周永亮，1995：190~191）。以上华人外汇储备额总计约 2200 亿美元，加上中国大陆的储备额，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大国或集团，在未来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中，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经济力量。

## （二）构筑“华人经济圈”的初步设想

欧盟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的理念正是以实现世界大市场为目标，从区域内率先形成开放市场，使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内自由流动、有效共享。构筑“华人经济圈”，突破了如欧盟般的地域界限，是更深程度的开放，更加符合全球市场化的理念。

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大陆以及统一海峡两岸日益高涨的呼声，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统一政权将最终彻底实现，于地理意义上的统一中华市场自然即将形成，而加快海外华人融入中华市场的进程也已具备了若干有利条件。

首先，在海外各国，华人的经济活动通常借助各类组织，各国华人企业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大陆、港台之间的经济关系，已存在着一定的网络。特别是由于中华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华人的组织与网络还具有自身特色。一是以“唐人街”作为区域性聚居与联络中心。在海外，每当华人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区，即“唐人街”（China Town）。它们是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社区，在历史上一度是华人群体保存文化传统、为新移民提供就业和团结协作对抗排华势力的城市小社区。今天，各国都市中的“唐人街”依然居住着许多尚未融入本地社会的老移民，成为中国传统行业（如餐饮业、成衣业）的聚集地，由于“唐人街”保留了一定的中华文化风貌，成为各国的旅游观光地。各国以“唐人街”为核心，初步形成了海外华人的有形网络（沈立新，1992）。第二个特点是各种民间社团成为散居华人交往的网络渠道。海外华人自登上异乡国土之后，就始终以各种民间社团的形式紧密地团结在一

起。据统计，1950年在海外的华人社团约有4847个（其中亚洲有4201个），1991年增加到9093个（其中亚洲有6154个）（李明欢，1995：5）。华人社团的组织形式在纵向上可分为四个层次：房（家族）——宗亲会（血缘组织）——会馆（地缘组织）——中华会馆（或中华公所）（Sung，1967）。有的研究在“会馆”这一层次又进一步区分出“同乡会馆、商会、堂、方言集团、政治社团、娱乐社团”6大类（Wong，1982）。这些组织形式与他们在国内迁出地的社团组织形式几乎完全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人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强烈的承袭性。

另外，海外华人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经济团体，在内部形成齐心协力以求生存，在团体之间相互联络以求发展。在这些经济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以血缘、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各种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政党“马华公会”为帮助华人克服由于政府限制华人经济的政策所造成的困难，而向华人创办了“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并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公共企业集团。菲律宾的华人共组织有各种大小社团1200多个，但集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为一身的最具权威性的团体是“菲华商联合总会”（陈碧笙，1991：346~355）。这个组织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菲律宾“菲化”浪潮中，由华人的各地方性商会、行会于1954年联合成立的，以便向政府协商、抗争以维护全体华人的利益。

依据各国华人数量和经济实力，现在在各个国家都成立了不同规模、不同名称的华商联合会，而且这些国家的华商联合会，根据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正在建立跨国界的经济网络。1963年，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商团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华商国际贸易联谊会”，自1970年起，因美、加等国华商参加而改称“世界华商贸易会议”，每年召开年会，编印有《华商贸易月刊》。1991年和1993年分别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召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千名华人实业家出席。

尽管海外华人的各经济活动还较为分散和零乱无序，没有人或机构在统一进行组织，但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华人文化与心理的凝聚力将使这些活动的主体不自觉地向着某种共同的发展方向，即最终朝向构筑“华人经济圈”。

## 二、正视“华人经济圈”的聚合效应

“华人经济圈”的形成，无疑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最为显著的，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将呈现大发展。“华人经济圈”内的互动必会加强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经济联系，对其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海外华人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四种：直接投资，为发展经济提供急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就业机会和市场销售渠道；商业贸易，包括与投资相结合的“补偿贸易”；资金捐赠，推动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科研、教育和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回国探亲旅游，迅速增加中国旅游业收入，也间接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另外，“华人经济圈”对海外华人所在国的经济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如果华人经济实现一体化，通过中国实施降低关税税率、协调产业发展、相互开放市场等政策，也必会使中国的市场容量剧增，其他各国与中国加强贸易联系的渠道也将变得更加畅通，进而有利于世界大市场的早日形成。

以经济合作为契机，经济上的正效应也会带来政治上的正效应。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经济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本，经济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大陆和港、澳两地实现经济一体化、建立中华经济圈，将会在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逐步实现海峡两岸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全面交流和政治层面的接触。台独思潮违背人民意志，不利于两岸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将有效抑制台独势力的扩张和分裂祖国、破坏统一阴谋的蔓延。尽管两岸间由于历史的原因，还存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分歧，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当今世界，

一切政治、宗教甚至民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终都将由经济利益所支配而发生根本变化。只要海峡两岸能不断拓展经贸合作，逐步开展政治对话和协商，定能以经济一体化为契机，最终实现国家、民族的和平统一。

一个民族海外成员的地位与其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是息息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被承认、被尊重才使得散居海外的华人于所在国中的地位得以改善。中国政府对构建“华人经济圈”持积极态度并配合以具体的政策、行动支持，才能切实推动“华人经济圈”的形成。

首先，中国政府可以尝试普遍给予海外华人以“双重国籍”。这样，既有利于解决海外华人于所在国的合法身份问题，更有利于其自愿选择投资、发展贸易市场，可以更广范围地为中国经济建设融入资金、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提高中国市场的资源整合速度和质量。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订条约，规定原来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可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今后的国籍（梁宽明等，1994），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也按照这一原则得到了妥善处理。下一步，要以成功的尝试为经验，进一步拓宽“双重国籍”政策的应用范围并争取将其上升到国家法律层次。

其次，注重政策导向作用，鼓励各国的华人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积极参与所在国的经济建设，对于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华人与华裔的有关事务，采取尊重该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各国政府和本地人对于华人作为特殊政治势力的疑虑，也能够为华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

第三，鼓励本国民间组织（如华侨联合会等）与各国的华侨社团发展文化、经济交流活动。通过民间联系，吸引海外华人、华裔回国投资探亲、观光旅游；通过非正式形式从文化氛围和感情上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延续和华人经济活动的发展积蓄推动力量。

第四，积极建立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华人集聚国家平等合作的睦邻

友好关系，更进一步为各国华人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积极发展与各国全面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关系，使得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是国家之间全面经济关系中民间交往的一小部分，这样既可以保持国家官方经济关系与民间经济关系两者之间的平衡，又能够保持民间经济关系中华人企业与该国本地人企业之间的平衡，努力发展一种在结构上保持各方面平衡和稳定持续的长期性合作关系。

总之，中国政府对于“华人经济圈”，在给予支持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各方面关系的平衡，使得与华人之间的经济交流被纳入到与各国之间经济交流的总体框架之中，避免对各国的外交、经济关系和华人在当地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 三、试水“亚元区”，稳定亚洲经济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指的是某一区域内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金融领域中实行协调与联合，形成一个统一体，最终实现统一货币体系的过程。它是以“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一场货币体制革命。该理论认为，最优货币区是指由一些彼此间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自由，产业结构不同而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所组成的独立的货币区。这种最优货币区的主要特点是，在该货币区内，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汇率能够统一，区内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较协调，各成员国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并保证区内各种货币的充分可兑换性。所谓“最优”，是指形成这样一个货币区后，能在总体上达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即达到区内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对外收支平衡等三大目标。

实行货币区有利于资源在区内的有效配置，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和汇率投机，应付外来金融冲击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但不利之处就是区内各国要放弃一部分政策运用的自主权。实行货币区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趋势。

当今已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区域性货币有欧元和美元，它们的形成

都是以经济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欧元的形成、使用及最终确立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是基于欧洲统一市场的推动和欧盟的建立与不断壮大；美元曾经一度是世界货币的唯一形式，当然离不开美国经济长期“一枝独秀”的繁荣态势，即使在当前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形势下，美元仍然依靠美国的经济实力而继续走势强劲。在亚洲建立“亚元区”的构想，也是主要源于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一体化势头。

亚洲经济从日本的迅速崛起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再到近些年东南亚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同的阶段共同构成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例，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9% 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 2002 年的数据已表明，东亚地区的高水平经济增长率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特别是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不仅为本国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提供了动力，而且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投资和贸易的广阔市场。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由一隅而观全局，整个亚洲经济呈现勃勃生机。

此外，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教训就是必须加强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协调。危机后，亚洲各国采取了若干措施：建立一个加强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新机制，包括建立防止金融危机的地区预警机制、邀请国际金融机构协助区内改善财政结构、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短期财力安排作为特殊储备、通过合作安排融资问题，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有关国家援助资金的不足；建立地区金融协商机制；建立货币互换机制；成立亚洲债券基金（ABF）。

在亚洲，东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地理上相对独立，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有明显差异，经济发展各有特色。因此，在一体化的空间安排上，应首先加强亚洲次区域合作，等

到次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泛亚洲一体化也就水到渠成了。当前，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最快的是东亚地区，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10+5），人口超过20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000亿美元，外贸总额超过23000亿美元。东亚各国区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已达50%左右，外汇储备超过8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欧元区的外汇储备（34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对推动区内经济金融合作都有强烈的愿望，“10+3”（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三国）模式和“10+1”（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模式的初步形成，标志着在东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朝着制度化、体制化的有利方向发展。可以说，东亚已经具备了加快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条件。

亚洲货币一体化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一方面，中国是当今亚洲最为强劲的经济发源，其对货币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必定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

中国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也可以在许多方面受益。第一，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金融走向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随着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亚洲地区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并发挥大国的领头作用，能够使亚洲经济合作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经济的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第二，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倡导建立以人民币为基准的“亚元”机制，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成为国际货币，则货币发行国不仅能获得铸币税和大量低成本国际资本供应的好处，也能对国际经济组织施加更大的影响，促其制定和采用符合本国利益的政

策。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在世界和地区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如果中国能够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并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将加快人民币成为重要地区货币以至国际货币的进程。第三，中国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抵御金融冲击、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加入 WTO 后，固然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外部市场重新定位等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中国与亚洲各国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就可以充分利用集体的抗金融冲击能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调整震荡和外部冲击做好充分准备。

## 第五节 走向世界的“中国式社会”

面对新的世纪，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利害得失，用历史照亮未来，甩掉历史包袱，走出“盛世怪圈”，走出科层封闭的固态化社会，融入扁平开放的动态化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由封闭内卷的二元社会向开放外拓的一元社会转变，走出农业文明的循环往复发展模式，实现由社会管制向普遍服务转变、由经济限制向经济导引转变、由社会固化向社会流动转变、由信息封闭向信息共享转变、由文化排斥向文化包容转变、由对外封闭向对外开放转变，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由利益博弈向规则博弈转变，释放地缘、血缘、姻缘等人身依附关系对社会个体创新潜力的束缚，避免“西班牙幻影”，面向未来，引领世界新文明。

### 一、警惕“西班牙幻影”

在地理大发现的哥伦布时代，在强大的王权和狂热的宗教信仰支撑下，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西班牙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但这奇迹也像神话故事那样，见首不见尾，缥缈不定，来去匆匆，像幻影一样破灭。

西班牙在美洲发现贵金属矿之后，“1521—1600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有1.8万吨，黄金200吨。加上走私等因素，流入西班牙的金银估计是此数的两倍。”<sup>①</sup>，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潮水般涌入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为宗教信仰、为殖民扩张而进行的战争，而没有用来发展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工商业。势力强大的王公贵族不愿意看到工商业的发展导致新兴势力的崛起，他们甚至荒唐地把数以万计的从事工商业的外国人，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西班牙人渐渐习惯了不去投资本国的工业，而转身购买国外昂贵的商品，久而久之，国内的工业极度萎缩，而货币又急剧贬值，人们却还沉迷于消费。到16世纪下半叶，曾经拥有难以计数的金银和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西班牙，在世界性的演出中开始谢幕。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西班牙此时只扮演了“过路财神”的角色，因此拥有了“黄金漏斗”的称谓，最终被金山压垮。除了奢侈的社会风气，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老百姓甚至也没有获得像样的衣、食、住、行。西班牙的标志性人物塞万提斯生前出版了许多书，他的戏剧作品在当时也大受欢迎，但是，他年老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所认识的那些大人物都没有给他足够的生活资助，以至于他死的时候仍然十分贫困。塞万提斯的命运，在有意无意间折射了西班牙的荣辱兴衰。因此，运用社会资本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形成国家内在的实际的生产、研发、创新能力，是避免“西班牙幻影”的必然选择。“西班牙幻影”说明，只积累财富而没有进行相应的经济集成、政府创新、文化精进、社会进化，任何财富的拥有者都是昙花一现；不激发和维持人们的创新力，一个国家的繁荣就不会长久。

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改造和升级传统的制造业，我们应实现供应链向价值链的转变，对低端手工制造业实现外包，利用全球更加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实现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对高端技术

<sup>①</sup> 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含量较高的精细制造业，应通过引进全球先进的技术人才，利用知识的扩散效应，逐步实现技术、经验等隐性知识的沉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正是通过高薪聘请大量的国外高级技师（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逐步实现了自身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化。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改变传统的产业跟随，走产业原创之路，避免“香蕉现象”<sup>①</sup>；走“技术引进——生产能力——创新能力”的技术发展之路，实现产品的“OEM——ODM——OBM”<sup>②</sup>。同时，在产业的升级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应当注重产业网络的培育，发挥产业内部的人才自由流动、技术共享、知识沉淀，发挥产业之间的协同互动，体现产业创新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辐射力；细化产业分工，拉长产业链条，增加各环节附加值，实现产业链的价值整合，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

此外，世界的扁平化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可阻挡。地域、文化、技术、知识等一切因素都再不会成为分工的阻碍，世界变得更小，个人却变得更强大。有了百度、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所创造的公共平台，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角落，传送智慧产品、智慧资本，它们还可以拆解、递送、散发、生产以及重新组合。在世界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历史进程中，各种资源要素在国家之间加速流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大规模的资源整合利用，分工的边界将由生产要素决定，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将由于各自比较优势的积累而不断得到加强。资源的整合，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整合、人的潜能的整合，将成为新兴的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点子公

<sup>①</sup> 香蕉现象原意是形容中国人到外国后出现“皮黄肉白”的文化丢失现象，这里指市场越成熟，创意就越软，创新的动力就越少。

<sup>②</sup> OEM, original - equipment manufacture, 订牌制造；ODM, own - design manufacture, 自己设计制造；OBM, own - brand manufacture, 自有品牌制造。

司、创意产业的发展，将为推动社会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将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拥有了具有创新潜力的人，谁才能引领产业发展的潮流、才能处理产业链中价值增值最大的部分，实现自身知识资本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中国不缺乏富裕的时代，然而能够强大到称霸世界的盛世却是屈指可数。面对新世纪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中国由富变强的历史进程，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国家竞争力、创新力等“软实力”的提升，注重战略性能源的储备与安全，注重人才资源的积累、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中国自身的“粘实力”，把世界上一切优秀人才、高新技术、资金、市场需求都粘到中国来，在世界性关键资源的配置和市场占有中拥有一席之地。

## 二、走出“盛世怪圈”，甩掉历史包袱

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往往不是起于民不聊生的衰败之世，而多爆发于“太平盛世”。西汉初期无为而治，很快换来天下“太平”，南方各诸侯国尤其富庶，但他们却领头、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七国之乱”；汉末王莽易鼎，天下汹汹，其时正是大土地制度登峰造极之时，上层社会之穷奢极欲令人瞠目结舌；三国分鼎，各自修养生息、恢复生产，西晋建国不久即臻“盛世”，而有石崇等辈“斗富”的故事，正是此时爆发了“八王之乱”；唐明皇承先祖余烈，奋发有为而有“开元盛世”，不想乐极生悲而有“安史之乱”，心爱的妃子也吊死马嵬坡，后虽平定，而国势衰落，大唐沦为藩镇之天下；北宋国盛民富，末期联金灭辽不久却为金人所灭，南宋末期联合蒙古人灭金却最终为蒙古人所灭，两宋虽未亡于大乱，却是地地道道亡于盛世；明朝直至末期，国势鼎盛、民间富庶，以至于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科学革命”，仅因西北一地灾荒而酿成大乱、以至亡国；清初150年号称“康雍乾盛世”，而后却国势立衰，乃有白莲教起义，八旗尽废，乃用绿营，后太平军起事，绿营尽废，而起团练，而有湘、淮军，甲

午战败，淮军尽没。究其原因，农业文明造就的社会阶层固化无法化解社会运行所形成和积累的风险。面对社会的转型，中国应甩掉历史包袱，加速实现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运用现代商业社会的规则，重树社会经济伦理，跳出农业社会的藩篱，走出“盛世怪圈”，避免历史的重演，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型农业经济中走出来，发展多样化的经济系统，构建开放的、扁平的、信息共享的、资源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

### 三、融入扁平开放的动态化社会

中国的传统儒学从本义上说表达的是人类基本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学说，“儒”字，左边一个人，表达的是对个人的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对中国农民的关怀，右边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而”，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天降甘露，因此求雨的仪式就是最隆重的大事，由此可见，儒家学说本身体现的就是民意的表达。在礼乐分崩离析的时代，孔子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诠释，只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解释下才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朱熹的解释下导致了皇权对中国社会的完全控制，在王阳明的阐释下固化了人们的心灵，在朱元璋明朝海禁的封闭内卷下，社会等级、家庭伦理、生存信念、对外封闭的束缚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超稳定性，也由于缺乏柔性而呈现出脆弱性。这种地域、社会层级的固化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由于封闭内卷而无法得以释放，最终导致风险尤如火山喷发般爆发，形成社会动荡，王朝更替，社会积累的巨大财富不断在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变革中灰飞烟灭。因此，现代政府不应视民意的表达为洪水猛兽，政府对于开放社会的管理手段应当与时俱进，从舆论控制向引导民意合理表达转变。“大禹治水”的成功就在于对洪水的合理疏导，使之造福社会。通过构建民意共享信息平台，倾听百姓的声音，形成政府回应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的积累。不仅如此，我们更需要打造透明政府、阳光政府，通过政府的开放主动迎合百姓的公共需求；通过构建社会

普遍服务体系，防止社会转型的断裂，防止社会群体的断裂、防止空间地域的断裂，防止现代化进程的断裂；通过政府再分配体系的建设，弥补社会收入差距，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经济发展的帕累托改进，走出科层封闭的、固态化的“面包夹潜水艇”<sup>①</sup>社会，融入扁平开放的动态化社会。

#### 四、走向开放外拓的一元社会

中国社会应实现从封闭的、静止的、排斥的、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向开放的、流动的、包容的、现代的一元精英社会转变。在传统社会中，个体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束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一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主要依靠身份关系来调节，而身份关系的取得、变更和消灭又带有人伦性和随意性的特点。这样的等级观念和身份制度就严格限制了个体的身份地位和行为自由。精英社会，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勇于开拓创新、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所组成的阶层。在法律上处于精英社会的个体社会地位平等，在经济上任何人发财致富机会均等，精英阶层是开放的，任何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精英阶层，农民、工人也能成为精英，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受教育年限的长短只决定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多寡，而知识的沉积只能在概率上决定社会个体成为精英的概率大小，应尽量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代际之间的沉淀，避免传统社会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真龙的后代不一定是呼风唤雨的龙，精英的子女只有通过平等参与社会竞争才能成为精英，避免出现社会等级的世袭化，避免市场以外的力量例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伦理关系对于地位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影响，实现从人身依附的身份社

<sup>①</sup> “面包夹潜水艇”是黄仁宇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的一种比喻，上下大而无当，中层界限极为模糊，且常与皇权合流，既依附之分享权力，也垄断知识。上面的一块是官僚，下面一块是亿万农民。国家既没有办法将他们有效的联系在一起，使其发挥出巨大的效用，也不可能根除这两个阶级，用一个一体化的阶级取而代之。

会向独立、法治的契约社会转变。

在社会阶层的纵向升降中，扩大社会进阶的通道，破除“高考独木桥”这一唯一的升迁通道对于社会资源的浪费，实现教育的定位从“选拔人”向“培养人”转变，实现国内社会阶层之间的多渠道流动，打破“学而优则仕”的单一官本位社会晋升渠道。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还应打破城乡双重户籍制度对于农村人口转移的限制，通过城乡人员的区域流动，逐步通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缩减农民阶层的数量，增加知识分子——具有创新潜力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数量，推动社会阶层的逐步升级，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只有通过农民生存空间的横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变一家一户的分割式小农生产为集约化农场式机械大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国际上，打破西方国家所固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实现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多极化，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充分利用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关键性创新资源，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实现国际信息的普遍流动，开启政治上的平等对话机制，充分利用国际社会沟通，消除由于信息封闭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消除中国威胁论消极影响，倡导中国和平崛起对国家社会的历史推动意义。在文化上做到包容与理解，“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避免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史上玉皇庙与耶稣教堂之间民教冲突所引发的“义和团”民族运动对中国社会经济积累和社会秩序的颠覆性破坏。一方面我们要放弃“文化同化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一切外国的文明都将被同化；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席卷全球的文化风潮中，捍卫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避免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同化。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互相尊重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文化的互通有无和协调一致发展，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

开放外拓的社会还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沉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退出

机制。社会的普遍服务为民众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实现的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使人们不会因天生禀赋的不平等导致基本生存权的丧失，导致对社会的不满和抱怨，出现自我毁灭和破坏社会秩序的非理性行为。同时，社会信息的广泛透明、公开，各种生存和自我成长知识的便利获得，民声、民意表达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公民社会的形成，都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BBS的疯狂灌水，博客运动的兴起，网络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正轨民意表达渠道的有益补充。

### 五、启智开扉，探索全球化新战略

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应当以大国身份，增加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第一，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话语权，构建信息沟通机制，主动以开放的心态了解世界并让世界了解中国，避免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对中国的误读和中伤。同时，我们也应避免“老子也曾发达过”的“阿Q精神”，陶醉于历史悠久文明古国的光环中、沉醉于历史辉煌光晕中，一提起文化就回到过去，历数祖先的卓越超群，历数传统的源远流长，历数本民族文化的优越及其历史影响，而对于如何把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变成现实的文化竞争力，既缺乏认识又缺乏行动。面对群雄并起、全球竞争的历史格局，任何满足于已有历史辉煌、躺在祖宗功劳簿上自我陶醉的做法，都是没出息、没出路的行为。只有通过文化的不断精进，融会中外、贯通古今、引领时代风骚的新文化创造，才能融入国家主流社会，赢得别人尊重、赢得自身的话语权。

第二，通过国际分工协作的不断广泛和深入，中国需求的不断扩大，利用市场供求影响全球资源的流动和利益分配，打破“依附论”的利润分配机制，打破重视物质资本形成，轻视人力资源开发，重视工业化、轻视社会服务，重视封闭内向发展、轻视对外开放，确立以资本积累为重心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发展路线。构建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

各国经济发展的地位平等和机会均等，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完善联合国的资源再分配机制，通过国家救援与资助，避免资源贫瘠、经济贫困等边缘地区的出现，避免天堂与地狱的同时出现。

第三，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基本前提下，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等“硬实力”以及教育、科研、创新等“软实力”，增强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重大事务处理中的政治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逐步形成国际事务的共同协商机制；通过与第三世界的合作，实现国际政治的多元化，避免以武力解决一些本可以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的国家争端。美国绕过联合国悍然出兵所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引起的恶劣影响与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所体现的积极姿态，恰恰体现了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要走出农业文明简单的循环往复发展模式，引领世界新文明，实现与时俱进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历史性创造，需要一种海纳百川的恢宏大气度和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需要站在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现民族长足发展的战略设计。在这里，农业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需要保护、继承和弘扬，但不能一味地在文史典籍的博大精深、古代园林的超尘脱俗、丝绸瓷器的绰约风姿、绘画戏曲的绮丽隽永上孤芳自赏，对于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精华都要勇于接受，善于从传统文化遗产中开掘新内涵，善于从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自己创新的路径，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引领新文明。

赓续历史文脉，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明，需要脚踏实地的辛勤劳作和系统而务实的自我定位。要增强中华民族的觉醒意识和文化自信心，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最大限度地把曾经辉煌的农业文明转化为现实的知识文明、后现代文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和健全人格，培育全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独立思考，善于跨越一切人为障碍，用自身雄厚的文化底蕴树立人类公认的文明标准，用全新的民族品牌推销国家的竞争实力，奠定自己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